

宋代江南地区流行病考证*

袁冬梅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重庆 400015)

[摘要] 现代医学认为流行病是由各种生物性致病原或称为病原体所引起的一组具有强烈传染性的疾病。而从传统医学角度而言,所谓流行病是指具有温热病性质的急性传染病,属温热病中具有强烈传染性、病情危重凶险并具有大流行特征的一类疾病。在古代文献中,一般称之为疫、疾疫、瘥、札、疠等。宋人也大体承袭了这一提法。通常情况下,疫病与流行病无法确切区分,因此,统称流行病为疾疫或瘟疫。宋代江南地区是流行病的多发区,特别是太湖流域一带,从文献记载来看,显著多于其他地区。这大概与江南地区水网密布,气候温湿、人口密集、人员流动频繁、经济较为活跃细菌病毒易于繁殖有关。该地区频繁发生的流行病,不仅造成了大量人口的死亡,并对当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均造成了相当大的冲击。

[关键词] 宋代;江南地区;流行病;疾疫

[中图分类号] R18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598(2008)06-0083-08

一、流行病含义及研究现状

(一)流行病含义

一般说来,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对疾疫的解释不完全一样,但都认为疾疫具有流行性和传染性特征。如传统医学认为疾疫是“具有温热病性质的急性传染病”,“属温热病中具有强烈传染性,病情危重凶险并具有大流行特征的一类疾病”。而站在现代医学角度对疾疫的界定则是:“传染病是由各种生物性致病原或称为病原体所引起的一组疾病,这些病原体极大部分为微生物,一部分为寄生虫。微生物有病毒、衣原体、立克次体、支原体、细菌、螺旋体和真菌。寄生虫有原虫和蠕虫。据发病的缓急、病程长短可以分为急性和慢性两类。在古代文献中,流行性传染病一般称为疫、疾疫、瘥、疠、札等,如《左传·哀公元年》:“天有灾

疠。杜预注:“疠,疾疫也。”《列子·汤问》:“土气和,亡札厉。札即指瘟疫。宋人也大体承袭了这一提法。如北宋司马光在《类篇》七下疠部疫下注引《字林》云:“病流行也。”指出了疾疫的流行性特征。南宋初年郭壘在《伤寒补亡论》中也认为:“春天行非时之气,中人长幼病状相似者,此则温气成疫也,故谓之温疫。”南宋真德秀在《为民祈安设醮青词》中提到“天令或愆,致札瘥之害,民生何辜?重罹天闕之伤念,忝任于抚摩,殆不胜其忧惻,遣医馈药,常切关心,遣粟散缗,曾无虚日,虽勉修于人事,终未弭于天灾,是用虔抒丹诚、仰干渊听、以仁救厄,愿推慈悯之恩,变戾为和,亟赐嘘呵之力。”。在传统医学里,札和瘥均指疾疫,但也有范围上的差别,通常把大流行瘟疫称为“札”,把散发瘟疫称为“瘥”。由于疫病与流行病无法确切

* [收稿日期] 2008-10-11

[作者简介] 袁冬梅(1970-),女,中共重庆市委党校,讲师,研究方向:宋代区域经济,基层党组织建设。

在现代专业学术著作中,一般把据西方医学体系发展出来的医学称为现代医学,由中国原有医学发展起来的医学叫做中国传统医学或祖国医学。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传统医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502

王季午,主编.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传染病学,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1.

余云岫.古代疾病名侯疏义,见《说文解字病疏》(中),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3:148

(宋)郭壘.伤寒补亡论,北京,中国书店,1992年4月.瘟疫和温疫在古代甚至现代的温病学著作中基本不加区别,认为可以相互替换.如章楠认为:古无“瘟”字,“温”“瘟”义同.见《医门棒喝初集·医论》卷二,第70页,中医古籍出版社,1999.

(清)陈梦雷编《古今图书集成》卷一三《历象汇编·庶征典·疫灾部》。

区分,因此,统称流行病为疾疫或瘟疫。为行文的方便,本文一律统称为疾疫。

(二)流行病研究现状

现代学术界对于中国古代疾疫问题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初,到目前为止,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初至20世纪80年代。余新忠先生认为这一时期疾疫史的研究并没有引起史家的足够重视,从事疾疫研究的往往是一些经过专门训练的医师。由于缺乏文史工作者的参与,疾疫史的研究成果主要局限于医疗技术发展、古今病名对照、疾病的流变等纯技术的领域,而对疾病医疗所蕴含的社会文化意蕴甚少揭示。因此,医史学界的相关研究虽然长期存在,但并没有表现出关注人、关注生命的研究旨趣,只是作为科技史的一个分支存在。这一时期医史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陈邦贤和范行准等人。其中陈邦贤在《中国医学史》中对中国疾病史及历史上传统传染病的病名、症状、和某些关于该病的重要史料作了初步的揭示,堪称中国医学史研究的开山之作。陈著的第四章介绍了宋元医学的概况,第八章介绍了中古疾病的名称,其中第一节即是关于传染病的种类介绍。除陈邦贤的《中国医学史》外,其他专著对宋代的疾疫问题也有所涉及。如邓云特的《中国救荒史》,陈高儒的《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都对各朝代的灾害分布作了统计,其中也包括了宋代疾疫的分布和次数。一些包括宋代在内的疾疫史论文也

发表于这一时期。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疾疫史研究进入第二个阶段。特别是自1990年以来,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历史上的疾疫在海峡两岸逐步兴起。到目前为止出现了大量疾疫史研究的专著或论文:如台湾梁其姿的《宋元明地方医疗资源初探》,对宋以来国家医疗政策和地方医疗资源作了深入探讨;张剑光的《三千年疫情》,是目前国内唯一一本关于中国疫病史的通论性著作,书中第五章对两宋疫情概况、救疗措施、重要疫情及医家与疾疫等问题作了论述;张志斌的《古代疫病流行的诸种初探》不仅对中国历代疫情发生的情况作了统计,还分析了疾疫与政局、战争、地理环境、人口、灾荒、民俗、防疫措施等因素的关系;业师张文教授在《宋朝社会救济研究》及《中国古代流行病及其防范》^⑩中也对发生在中国古代的流行病的原因、如何预防和控制等方面均做了透彻的论述。通观以上论著或论文可知,疾疫史研究大多是针对整个古代通史或集中论述明清时期。这大概出于明清时期资料相对丰富的缘故。对此,余新忠在《20世纪以来明清疾疫史研究述评》^⑪一文中已做了详细论述。其实,通过对宋代文献的系统梳理可知,宋代疾疫的发生是比较频繁的,对社会所造成的危害也是触目惊心的。而这方面的研究无疑尚很薄弱,现有论文主要针对南方滇、黔、川、渝、闽、粤、琼等地的瘴疾研究。^⑫除

传染病一般都具有一定的流行性,不过流行病未必是传染病,比如现代的心血管疾病。见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第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余新忠. 关注生命——海峡两岸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3).

陈邦贤. 中国医学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华东医务生活社,1953年;高辉远整理《中医对几种急性传染病的辨证论治》,人民卫生出版社,1960

这一时期的疾疫史文章不少,限于篇幅所限,本文所列文章只是其中部分而已,如伍连德《中国之鼠疫病史》、《中国鼠疫史》见《中华医学杂志》第二二卷第11期,1936年;李祥麟《鼠疫之历史》见《中西医学报》,1910年第8期;李健颐《鼠疫之研究》见《医药卫生月刊》1932年第5期;伍连德《中国霍乱流行史略及其古代疗法概况》见《同仁医学》第八卷第4期,1935年;余云岫《霍乱沿革说略》见《新医与社会汇刊》1928年第1期;郑伟如《霍乱史话》见《申报》1946年7月26日。

余新忠. 关注生命——海峡两岸兴起疾病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3

梁其姿. 宋元明地方医疗资源初探,中国社会史评论,3卷,中华书局,2001.

张剑光. 三千年疫情,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

张志斌. 古代疫病流行的诸种初探,中华医史杂志,1990,1.

张文. 宋朝社会救济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⑩ 张文. 中国古代流行病及其防范,光明日报,2003,5.

^⑪ 余新忠. 20世纪以来明清疾疫史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10.

^⑫ 对瘴疾问题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萧蕃.《汉宋间文献所见古代中国南方的地理环境与地方病及其影响》见《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63本第1分册,1993年4月;龚胜生:《2000年来中国瘴病分布变迁的初步研究》见《地理学报》1993年4月;左鹏:《宋元时期的瘴疾与文化变迁》见《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曹树基. 地理环境与宋元时期的传染病》见《历史地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张文. 地域偏见与族群歧视:中国古代瘴气与〇病的文化学解读》,《民族研究》2005年第3期。

此而外,对当时作为宋代经济和文化中心的江南地区,目前尚无这方面的专题性文章。可能与流传下世的宋代疾病方面的史料较为分散有关。

(三)本选题研究目标及江南地区范围界定

本文通过梳理宋代江南地区的疾疫流行情况,试图对宋代江南地区疾疫的种类、流行规律、规模、危害以及当时社会各阶层的反应及采取的措施等方面做一些初步探讨。由于疾疫具有流行性和急性传染性特征,每次疾疫的爆发都会给当地造成大量人口的死亡,特别是在战乱时期流行的疾疫。而和平时期疾疫死亡人口一般可达总人口数的 2%左右,最多时达 5%左右,虽然不至于破坏疫区的人口结构,但仍会对当地经济发展造成相当冲击,并带来诸多社会问题。可见,疾疫不仅是医学领域需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更是经济和社会领域应该关注的话题。因此,本文以期达到的目标是从疾病史的角度探讨宋代江南地区的疾疫流行情况,如疫名、疫区、疫情、疫期等,试图从纵向揭示宋代江南地区疾疫流变状况。以便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通过对江南地区疾疫流行现象的描述分析,尽可能找出流行病与江南地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口素质、区域文化等多种因素的相互关系。

本文之所以选择宋代江南地区为研究范围,是基于三点考虑:其一,宋代江南地区是宋朝特别是南宋统治的核心地区,该地区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及社会稳定程度都和疾疫流行有相当大的关系。

就地理环境而言,江南地处长江中下游,主要由平原和低山丘陵组成,尤以平原居多,特别是长江三角洲更是地势低平,河网密布,有“水乡泽国”之称。其中平原地区河网密度平均每平方公里 5 公里左右,杭嘉湖平原更达到 12.7 公里,居全国之首,该地水系众多,有长江、太湖、钱塘江等大小水

系交织其中,形成独特的地理环境。

就气候条件而言,江南地处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降雨充足,且多集中于 5 月至 9 月的夏秋两季,在保证农作物有利生长环境的同时,平原低地,降水集中也易发生洪涝灾害。

宋代江南地区还是当时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人口流动频繁,使得江南更易成为疾疫流行之地,疫病流行对宋代社会的冲击力也比其他地方严重。

其二,宋代江南地区史料相对丰富,可以为本文的研究提供较为翔实材料支撑,使得完成这一研究成为可能。

其三,宋代江南地区的地理位置、政治影响力、经济地位在全国范围内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代表性,研究其疾疫流行情况以及政府、社会各方面的应对机制,可以对宋代其他地区的疾疫流行情况及社会反应起到触类旁通的作用,同时也能为后世提供借鉴和启示。

本文所指江南地区,主要依据《江南通志》所界定的范围,即北达徐州,西临荆楚,南到闽越的江淮下游地区。在宋代主要指江南东路、江南西路、浙江东路、浙江西路、淮南东路、淮南西路,范围大体包括今天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四省和上海市的绝大部分地区。从范围限定看实际上已经属于广义的江南范畴,这样考虑的目的主要在于宋代疾疫史料相对较少且比较分散,范围扩大可以为选题提供更多的材料支撑。实际上江南区域的划定标准也是相对的,可大可小,具体范围应该在基本认识的指导下,根据实际研究的需要作出。

二、文献记载宋代江南地区疾疫流行情况

(一)宋代江南地区流行病种类

根据陈邦贤先生的总结,传统医学将传染病区

余新忠. 咸同之际江南瘟疫探略—兼论战争与瘟疫之关系,《近代史研究》,2002,5.

李玉尚. 和平时期的鼠疫流行与人口死亡—以近代广东、福建为例,《史学月刊》,2003.

对江南地区的范围问题,学术界有几种不同的界定,陈国灿先生认为,宋代江南是一个比较模糊和笼统的地域概念,从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来看江浙即指“江南”,其范围大体相当于今江苏、安徽两省长江以南地区和浙江省、江西省、上海市。见陈国灿著《宋代江南城市研究》第 7 页,中华书局,2002 年;李伯重先生认为根据地理环境、经济联系、历史渊源,江南地区包括明清的苏州、镇江、常州、松江、江宁、杭州、湖州、嘉兴、等八府及太仓州,大致是今天浙江东部一带,见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 年第 1 期;不少学者观点和李伯重先生基本一致,也认为江南地区应包括等苏州等八府一州,见《清代前期江南的劳动力市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 年第 2 期;而《中国历史地名词典》则认为江南指长江以南地区,在宋代主要指江南路,大致包括今天江苏长江以南,安徽长江以南,江西全部。《江南通志》认为“江南雄长诸省,地巨江淮,扼荆楚而接中州,襄瀛海而引闽越,洵寰宇之要区”。笔者认为江南既是地理概念,同时也是文化和经济概念,因此把文化大致相似、经济发展水平大体一致的南方大部分地区统称为江南是可以的。

分为七种病症:第一种伤寒,分为伤寒、温病、风湿;第二种痢疾,分为卒辟、赤痢、水痢、热毒痢、赤滞、大注痢、风痢、气痢等;第三种痘疮,包括肤疮、豌豆疮、登豆疮、豆疮、天行豆疮、痘疮、疮疱等;第四种麻疹,有麻、赤疮子、疮等;第五种白喉,有马喉痹、缠喉风等;第六种疟疾,包括牝疟、疟母等;第七种肺癆,包括虚劳、肺劳、风劳、传尸、急劳、血风劳、癆瘵、癆嗽等。以上七种传染性疾病在宋代都曾经爆发流行过。因此,宋人对不同疫也有一些认识。现录几则于后:

其一,伤寒:洪迈在《夷坚志》中记载“江吴之俗,指伤寒为疫疠,病死气才绝,即殓而寄,诸四邻不敢时刻留”。说明江吴之民对伤寒的高度传染性特征有所了解,并对因伤寒而死的人采取一些相对应的防范措施,“俗云有种虑染其后者而焚之”“不敢时刻留”。以焚烧病人尸体的方式杜绝伤寒病向周边传播是可行的。当时一些医学名家针对伤寒病症也采取了一些专门的治疗措施,体现了宋代医学对一般疫在预防和救治上已经取得一些成果。

其二,疟疾:是由疟原虫引起的虫媒寄生虫病,以周期性的寒战、高热、大汗、脾肿大、贫血为特征,主要通过按蚊传染。宋代疟疾比较常见,而江南地区处于中高疟区,人民更是多受疟疾折磨。宋人吕颐浩说:“涉夏以来,病躯益备,疟痢继作,皮骨仅存,药艾交攻,形神俱敝……”;王之道也说:“夏五月病疟,逾十日良已……此疾至丙辰夏而不能去,其热焦火,其寒凝冰,呻无虚日,……日毒之以万金之药,灸之以三年之艾驱之,终莫见于毫发之效也。”可见宋代患疟疾的人不在少数,因此

医书对疟疾的特征及类型有不少记载,如《圣济总录》说“疟发瘵时,或日作,或间日乃作也”。《和剂局方》记载“一日发,间日发,一发后六七日再发”。

其三,蛇蟆瘟:《夷坚志》记载:“淳熙十四年春,江淮浙沔气肆行,但不甚为害,唯中者觉头痛身热,不过三日而愈,名为蛇蟆瘟,言自淮北来。这种疫的传染性较强“……一吏以疾作告去。俄纷纷继之,过半不止。明日,趋庭之吏,三分仅有其一。当宴客,一倡方行酒,亦以出去,迨终席,无一人存。”

以上对各种病症的判断和描述,因为笔者医学知识的欠缺,不敢妄自推测,因此,只是遵照文献记载辑录而已。

(二)宋代江南地区流行病分布概况

据清代陈梦雷编辑的《古今图书集成》记载:宋代全国的疫流行有40次;邓云特《中国救荒史》第一编第一章对两宋疫情的统计是32次;张剑光《三千年疫情》中统计为51次,其中北宋22次,南宋29次。以上统计均指两宋全境而言,没有专门针对宋代江南地区的区域统计分析。其实,据梳理宋代正史、政书、类书、文集、笔记小说、方志等文献所知,两宋境内大小疫情远不止几十次。实际上,在宋统治的三百多年时间里,仅江南地区疫流行就多达150多次,平均两年左右即爆发一次,有的地方达到一年一次或一年数次。从区域分布看,疫又多集中于交通便利、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地区,如临安(多指临安府,包括所属九县在内),有时用“京师”或“行都”或“行在”等,有时也用“行在内外”,“府城内外”等说法。通常是疫的常发区。除临安以外,还形成以临安为中心,沿

伤寒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本文指狭义之伤寒,具体表现为因暴寒引动伏气而发者,在春则有寒疫兼温晚发等症;在夏则有霉湿挟热疫疠等症;在秋则有疟痢伏暑等症,不得谓温湿暑疫疫疠,绝对无暴寒感动也。见鲁兆麟、严寄澜、王新佩主编《中国古今医案类编·伤寒病类》第178页,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2001年6月。同时陈先生认为温病的特征是指发热而不恶寒;风湿指太阳病发汗已身灼热者。

陈邦贤.中国医学史.商务印书馆,1936:143.

(宋)洪迈.夷坚丁志.卷一五《张^三复生》,中华书局点校本.

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前集卷二《焚尸利害》;吕祖谦编.宋文鉴卷一二五.

疟疾分布广泛,鉴于北纬60度和南纬30度之间。北纬25度到北纬33度之间是非稳定性中、低疟区。北纬25度以南为非稳定性中高疟区。而江南地区的纬度位置正好处于疟疾的中高区,尤以这一地区的河流两岸、湖滨低洼地区及山区平坝和河谷地区的稻田区为甚。见刘约翰、赵慰先主编的《寄生虫病临床免疫学》,第75页,重庆出版社,1993

(宋)吕颐浩.忠穆集.卷三《辞免少傅两镇第四札子》,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王之道.相山集.卷二八《遣疟鬼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洪迈.夷坚丁志.卷五《蛇蟆瘟》,中华书局点校本.

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杭州市委员会办公室主编的《南宋京城杭州》1984年。临安府所属九县包括:钱塘、仁和、馀杭、临安、富阳、于潜、新城、监官、昌化。面积约七千四百平方公里。北宋末人口为二十万三千五百七十四户,姑以每户五人计,至少有一百多万,南宋初期为二十六万一千六百九十二户,南宋末为三十九万一千二百五十九户。

发达的水陆交通要道向西延伸至江南东路的当涂、婺源;江南西路的赣州、南康军、大庾、余干;向东至杭州,东南至余姚、慈溪、富阳;东北至湖州、昆山、吴口、镇江等地半径不等的扇状辐射态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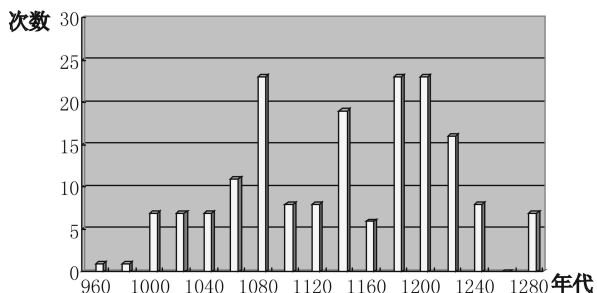
从现有事例分析,江南各地流行疾疫年数,疫情程度差异较大。明显呈现地区和时空差异。如有的地区几乎每年都有疾疫发生,甚至是一年数次。特别是两浙路的杭州府地区和湖州府地区疾疫流行十分频繁。从现有资料估计江南地区近一半左右疾疫流行于这一带,其他地区则偶有一次,从而形成以太湖流域为中心,四周呈零星状分布态势。这大致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交通条件、地理环境有关。

根据对疾疫发生的统计可知,江南地区疾疫涉及 78 处地方 150 次之多,其中又主要以两浙路为中心,达 87 次。尤以临安为重灾区,达 22 次。浙东、浙西有 13 次,其他地区多为零星状分布,通常是一次或两次,最多的不超过 13 次,合计为 68 次。对此有学者以鼠疫为例认为:从城市发生鼠疫的年次看,各地由于经济联系程度的影响而有所不同,在那些商品流通频繁的地区,城市发生鼠疫的次数多;而在那些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城市发生鼠疫的次数很少。以鼠疫推广到其他的传染病,笔者认为其流行的规律是大致相同的,即疾疫的频率和规模与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地理位置成正相关。经济发达、交通便利的平原地区由于人口众多且贸易频繁,易于疾疫的流行和传播。而经济落后、交通不便的山区则较少发生大规模的疾疫。以临安地区为例,作为南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疾疫次数和每次疾疫的规模都相对比其他地区集中和严重。正如苏轼所言“杭,水陆之会,疫死比他处常多。”而疾疫在时段上的流行规律则如下表所示。

江南疾疫不仅呈现显著的地区差异,在时空上的分布也是极不均衡的。从宋代建国到北宋灭亡共 150 年里,江南共爆发疾疫大约 46 次,平均近三年左右有一次疾疫流行。而在南宋统治的 152 年里,共有 104 次,几乎是不到两年就有一次,而且疾疫流行的规模、人口死亡率、对社会造成的危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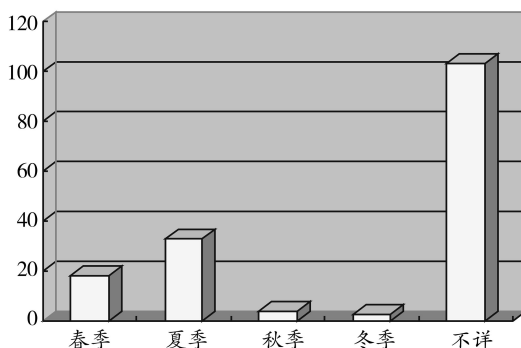
远胜宋代初期。从整个柱状图显示的趋势可知,疾疫在时段上的分布大致呈现驼峰形状,低谷在宋初的大约 960 年到 980 年的 20 多年时间里。统计数据为 2 次,从 981 年到 990 年的十年间,没有发现疾疫流行的记载。而从 991 年起疾疫逐渐呈增长趋势。在 1060 至 1100 的 40 年时间里,出现第一次高峰:另一高峰的出现大约在南宋 1140 年到 1220 年的约 80 年时间内。以上两个时段均是宋代社会战乱较多的时期。战乱本身已经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秩序造成极大的破坏,而战乱还使大量北方人民因战乱避难江南,致使江南人口大增,对环境、对经济发展都会带来一些不良影响。可见,在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发生异常变动时,即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或频繁战乱时,有可能出现疾疫的大面积流行,并导致大量人口死亡和生产破坏等恶性后果。

表一:江南疫情在时段上的分布频率



说明:以上是江南疾疫在宋代 300 多年时间里不同时段上的分布柱状图。竖轴表示疾疫次数,横轴代表疾疫流行的时段,次数的统计以二十年为基本单位。

表二:各地疾疫流行季节柱状图



说明:表四、表五对疾疫爆发的具体季节作了次数和频率方面的大致统计,依据仍然以表一为准。

李玉尚:《和平时期的鼠疫流行与人口死亡——以近代广东、福建为例》,《史学月刊》,2003年9月。

(元)脱脱等《宋史》卷三三八,中华书局,1978年。

以疟疾为例,影响疟疾流行的因素,除传染源、传播媒介和人群易感性三个基本因素外,疟疾流行还受温度、湿度、雨量、地理条件等自然因素,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卫生水平、农田水利建设、耕作方式、人群流动等社会因素的影响。见刘约翰、赵慰先主编《寄生虫病临床免疫学》,重庆出版社,1993年。

通过归纳分析可知,宋代江南地区疫情显著呈现集中的特点:包括地区集中,时段集中和季节集中。

(1)从地区分布看,整个江南地区涉及疾疫流行的范围比较广,大致有78个地方曾经有过疾疫流行。特别是两浙路(熙宁中分为浙东路和浙西路)更是疾疫的高发区,在现有的150多次疾疫看,有87多次爆发于两浙路,占总数的50%强,而江南东路、江南西路等地疾疫则相对分散(见表二:疾疫在空间上的分布)。两浙路疾疫又以临安地区最为严重,大约有22次,其次是浙江(含浙东、浙西)有13次。

(2)从时段看,已知150次疾疫中46次出现在北宋,占总量的三分之一强,有104次疾疫是在南宋统治时期爆发流行,且时间也相对集中于绍兴、淳熙、庆元、嘉定年间。这与南宋的统治范围主要在东南地区,比北宋范围要小,但其政治和经济中心却主要在江南有关。也和江南地区人民对环境的破坏和过度开发、人口骤增不无关系。尤其是北宋灭亡后,大批北民不愿受女真统治者的蹂躏,扶老携幼,纷纷南迁,出现“四方之民,云集二浙,百倍常时”的盛况。临安作为南宋的政治和经济中心,更是北民南迁的重要地区。所以,临安人口大增,据《咸淳临安志》记载,南宋咸淳年间临安府所属九县的人口数是一百二十四万之多,其中钱塘、仁和两县人口为四十三万二千零四十六,占全府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这些南迁的北民给江南经济发展带来技术和劳动力的同时,也带来了江南人口过密的压力,并增加了疾疫流行的机会,特别在流亡途中,许多流民因居住环境恶劣、生活水平下降,自身抵抗力减弱而患上各类疾疫。比如因按蚊的叮咬而导致疟疾发作;或因老鼠、跳蚤的传播而患鼠疫等。一旦患疫,在迁徙过程中还可能把疾疫带到下一个停留地。最典型的事例当数隆兴二年(1164年)江南大疫,当时因为战乱,二三十万淮甸流民纷纷往江南迁徙,由于生存环境恶

劣,加之受冻挨饿,结果爆发大疫,有近一半人死亡。剩下的一半人在流亡到浙江途中,又把疾疫带到那里,致使浙江也发生了严重的疾疫。

(3)从季节看,一年之中,疾疫又大多于春夏或夏秋爆发(特别是三、四、五、六、七月之间)。粗略估计大致有18次疾疫在春季流行,33次在夏季流行,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而秋冬则相对较少,其中秋季有4次,冬季有3次(见表四:疾疫在一年中的季节分布,表五:疾疫季节分布柱状图)。这大概由于春夏之交,气温回升,气候温湿,各类病菌容易繁殖有一定的关系,没有注明准确时间的则有103次。

需要说明的是表四对疫情在一年中各个季节的统计只能是一个大概。因为宋代文献对大多数疫情的描述比较简略,既缺乏对疫病名称、症状的具体描述,更缺少对疫病发生时间的准确记述。通观上述疫情记述,除少部分疾疫记载有具体月份外,66%左右描述比较模糊,只冠以“是年大疫”等大致表述,而无确切月份。对于这种现象,有学者认为可能受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记载中的详近略远,即灾害发生的时间和地点越近,人们对它的印象越深,灾害被记录的几率越大,从整体上看,灾害记录的次数及详略程度与灾害发生的远近成反比;二是历史资料的缺失,即年代越久,受战火或其他自然灾害的影响,留存在世的文献相对较少,统计到的灾害次数也就越少。尽管疾疫不完全属于自然灾害,但和自然灾害联系密切,在地方志中也往往将疾疫与水、旱、蝗等自然灾害一并记录在祥异类中。所以,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对疾疫也应该是适用的。当然,笔者推测疫情记录的粗略可能还与文献记录者大多不是专业医学人士,缺乏医学知识有关;或者即便是医家也可能对刚出现的新疫病不甚了解。故除非是专门的医学著作,否则一般的文献对疫情的记录都比较粗略。

三、疾疫的等级分类

疾疫受地理环境、气候条件、自然灾害及社会

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五八《户口》,《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影印本。

传播人疟原虫的媒介为按蚊。一般认为只有吸人血、对疟原虫易感、群体数量大、生活周期长、孢子可在体内发育成熟并能进入唾腺的蚊种才能成为媒介。我国传疟的主要蚊媒是:全国平原地区是中华按蚊,南方山区主要为微小按蚊,一些山区或丘陵地区为嗜人按蚊。一般而言,外来人较疫区常住人口易感,婴、幼儿较成年人易感。见刘约翰、赵慰先主编《寄生虫病临床免疫学》,重庆出版社,1993年。

鼠疫,全名为流行性淋巴腺鼠疫,俗称“黑死病”,是一种以老鼠、跳蚤为传播媒介,传播速度极快的传染病。

(元)脱脱,等.宋史卷六二《五行》下,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

葛剑雄.未来生存空间:自然空间,上海三联书店,1998

经济文化水平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不同地区,不同时间段的疫区范围是不一样的。就现代灾害学来说,疫情、疫期、疫区是衡量疫区灾害的三大基本要素。即根据死亡人数的多少、持续时间的长短、涉及区域的大小来判断一次疫情的强度。就宋代而言,宋人对不同强度的疫区一般有词汇指称:如疫、大疫、疾疫、疫疠、瘥、札、大札、凶札等称呼上的差异用以初步表明疫区的强度。除指称上的区别外,还有疫区范围、染疫人数、死亡人数、疫

情持续时间上的不同。从疫区范围看,表示疫区强度的描述性用语通常有“弥数千里”或“诸路疫”等;从死亡人数看,大多使用了“死者甚众”“死者不可胜计”“十之八九”“比户不遗”“户减十五六”“城市村落委弃婴孩至有不获”等程度用语。虽然这些用语带有模糊性特征,还不足以准确定位疫区强度,不过根据这些词汇所对应的疫情,大致可以将疫区划分为三种强度等级:轻度疫区、中度疫区、重度疫区。详见下表。

表三:疫区强度等级表

疫区强度等级	轻度疫情	中度疫情	重度疫情
疫区话语	疫、疫疠、札、瘥	大疫、疾疫	大疫、大札、凶札
疫区征象描述	死亡人数占疫区总人口数的“十之二三”或“死者甚众”等	死亡人数占疫区总人口数的“十之四五”等	死亡人数占疫区总人口数的“十之六七”以上,且多用“死者甚众”“死者不可胜计”,“十之八九”,“比户不遗”等描述性语言。
疫区范围描述	范围无准确界定,通常指较小区域,如单个州县。	染疫区域比轻度疫情广	范围甚广,如“弥数千里”“诸路疫”等。
事例	绍兴十六年(1146年)三月,临安雨冰,夏,行都疫;嘉定四年(1211年)三月,行都民多疫死。	绍定元年(1228年)春,大疫,比屋相枕籍,安吉尤甚,户减十五六,烹鱼者率从腹中得人指发	治平二年(1065年)夏,疫大作,弥数千里,病者比屋,丧车交路;浙西,熙宁中,饥疫,人死大半,至今城市寂寥。嘉定二年(1209年)行都、江南都民疫死者众,淮民流江南饥与暑并,多疫死;

说明:以上对疫区强度的划分只能是大致的标准,不可能有很精确的界定。而且古代对死亡率的描述诸如“十之二三”、“十之五六”等也不能完全等同于今天的百分比 20%至 30%或 50%至 60%。疫区范围的界定也只是一个相对的标准,不能单独用来判定疫情强度,必须和其他几项相结合才可能说明问题。比如有时某一较小范围内的疫情由于其死亡人数众多也可以列入中度或强度疫情。而且不同地区,不同时段所发疫区,其患疫人数、疫区范围、疫期长短,往往会受诸如地理环境、气候异常、自然灾害或经济发展水平、国家政策、社会心理等因素的影响而随时都会发生变化,因此,疫情强度的划分只是相对的。

就地理环境而言,在人烟稀少之地和中心城市、交通枢纽地区,同样的致灾因子,导致的疫区程度,灾难后果相差极大。

同时,疫区强度还深受国家政策,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素质、环境卫生等影响。宋朝政府对疫区的处置,往往要历经报灾、勘灾、救灾等一系列环节。不过,制度能否起到相应的作用,有赖于地方官员的配合与否。如地方官员是否在疫情发生后迅速报灾并尽责救灾?救灾中是否有效调动了各方力量?救灾官员的廉洁、能力、素质等,都有可能左右疫情程度。不可否认,疫区出现时,不少地方官员对发生于本地的灾情都能够积极组织救灾,政府也多次对救灾成绩显著的官员加以奖励,比如富弼、刘夔、张咏等。但也不乏某些官吏出于各种

目的瞒报、漏报、迟报,或救灾不力,致使疫情蔓延。如熙宁杭州饥疫酿成至少 80 多万人死亡的严重后果,与沈起、张靓等官员救灾不力不无关系。也有一些官吏故意夸大疫情,以贪取国家对灾民的振恤钱粮,这些都极有可能影响疫情强度的把握和救济。据《长编》载“熙宁七年(1075年),闻永兴、秦凤、河东路民饥,死者相属,累戒司给钱谷赈济,而官吏未悉究心,其令诸路转运司及所差官诣所部州军救恤,具死亡埋瘞数上农司”。对此类官员,中央政府一旦确信,通常会处以严厉的惩罚,但依然屡禁不绝。

其次,技术因素的影响,包括统计技术和医疗技术。疫区不同于一般的疾病,一旦爆发,则呈现快速变化状态,特别是当发生的疫区属于烈性传染

张建民,宋俭著. 灾害历史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 49.

(宋)李焘. 长编卷二六 “神宗熙宁八年二月癸亥条”中华书局,1978.

性流行病时,如鼠疫,一旦染疫,快则两三个小时,慢也不过两三天就可致人死亡。宋代医学虽有所发展,但在突发而至的疾疫面前,很多时候依然显得无能为力,更不能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特别是疫情出现后,假如没有严格隔离措施的话,随着灾民的大范围流动,在当时技术条件下,很难准确统计患疫及死亡人数,只能冠以“死者甚众”、“死者

不可胜计”、“十之八九”、“大疫”、“比户不遗”、“户减五六”等描述性语言而无法得出精确的统计数据。所以,宋代江南地区疫情从现有文献看,大多比较粗略。因此,我们所做的程度划分也只能是大致概况。从已知疾疫看,重度疫情大约有 59 次,占 30%左右,轻中度疫情有 91 次,占 70%左右。

(责任编辑:杨 睿)

On epidemics in the south of Yangtze River in Song Dynasty

YUAN Dong - mei

(Chongqing Municipal Party School, Chongqing 400015, China)

Abstract: It is believed in modern medicine that epidemic consists of a group of diseases caused by varieties of biological pathogens or pathogeny for short. However, in terms of traditional medicine, epidemic refers to illnesses that are feverish, prevailing, acutely infectious and extremely dangerous. In ancient literatures, it is generally defined as popular illnesses, diseases and plagues, etc. and on the whole, people in Song Dynasty also adopted the concept. But in many cases, epidemic can not be accurately distinguished from popular diseases, therefore, they are generally called epidemic diseases or plagues. The south of Yangtze River in Song Dynasty was obviously more frequently stricken by epidemics than other regions according to the literatures, especially, the regions around the Taihu Lake. Probably, it is due to the dotted lakes, warm and humid climates, dense population and frequent flow of people as well as the comparatively more flourishing economy, in which germs and viruses are prone to reproduce. The high frequency of epidemics in those areas not only caused a great many deaths but also severely impac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cal economy and social stability.

Keywords: Song Dynasty; the south of Yangtze River; epidemics; plagues

(上接第 79 页)

- [4] [8] [12] “四川省民政厅”卷 [Z]. 四川省档案馆,全宗号 54,目录号 4,案卷号 9421. 10595. 10215. [9] [14] “四川省建设厅”卷 [Z]. 四川省档案馆,全宗号 115,目录号 2,案卷号 3571. 3604.
- [5] “四川省公路局”卷 [Z]. 四川省档案馆,全宗号 130,目录号 2,案卷号 2364. [11] “四川省公路局”卷 [Z]. 四川省档案馆,全宗号 130,目录号 1,案卷号 288.
- [7] “四川省建设厅”卷 [Z]. 四川省档案馆,全宗号 115,目录号 1,案卷号 1228. [15] 四川省政府公报 [N]. (299). 7, (350). 8.

(责任编辑:杨 睿)

On outlay of peasants in Sichuan national defense construction during Anti - Japanese War

ZHANG Li^{1,2}

(1. School of Politic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2. School of Humanities, Xiamen University, Fujian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During Anti - Japanese War, the outlay i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in employment of peasants in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al defense in Sichuan and the main source of outlay came from treasury funds and local funds - raising such as diversion, ban, apportion and expropriation. The counties had to employ all kinds of available methods to collect funds because the treasury funds were usually not enough so that, to some extent, local economic difficulty was aggravated.

Keywords: treasury funds; local collection; employment of peasant labor; Sichuan; during Anti - Japanese War; national defense project; outlay